

安阳集
（上）
编年笺注

〔宋〕韩琦撰
李亮之笺注
徐正英



巴蜀书社

466112



〔宋〕韩琦撰
李之亮
笺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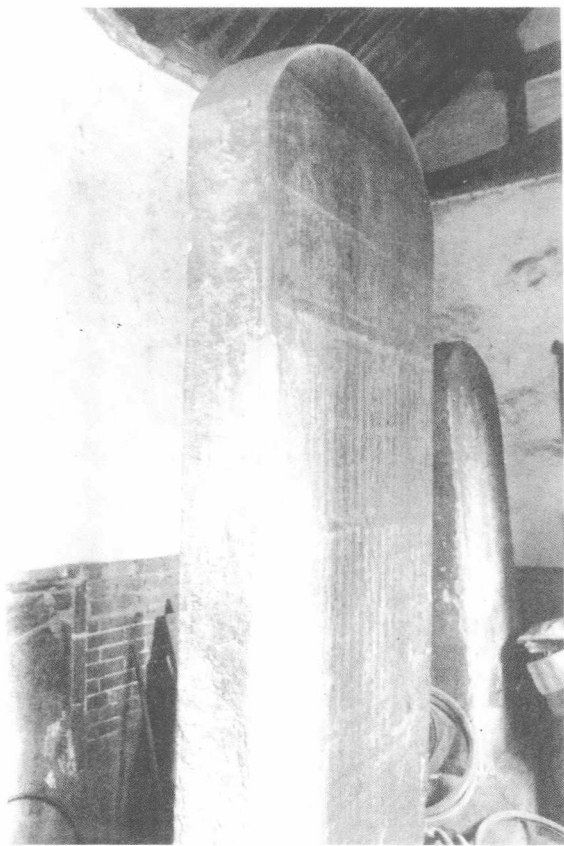
安阳集编年笺注
(上)



466112

巴蜀书社
中国·成都

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资助项目



昼锦堂记碑

此碑为宋参加政事欧阳修撰文（详见本书附载），尚书礼部侍郎蔡襄书丹，尚书刑部郎中、知制诰邵必题额，史称“三绝碑”。知相州赵良规立石。碑刻于北宋治平二年（1065）。圆首，通高2.73米，宽1.23米，厚0.27米。楷书18行，行39字。现藏韩王庙西厢房内。



元 代 重 修 韩 王 庙

此庙原为韩魏公生祠，始建于北宋熙宁中。金贞祐二年（1214）毁于兵火。元大德二年（1298）于原址上重建。正面为庙之正殿，左朱漆建筑为西厢房，《昼锦堂记》原碑及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碑刻二十馀版均收藏于此。

四库全书总目提要

臣等谨案：《安阳集》五十卷，宋韩琦撰。琦事迹具《宋史》本传。其集晁公武《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俱作五十卷。此本目次相符，盖即原本。琦历相三朝，功在社稷。生平不以文章名世，而词气典重，敷陈剴切，有垂绅正笏之风。吕祖谦编《文鉴》，录其文十首，其中如论减省冗费，论西夏请和，论事时，论青苗诸篇，皆正论凜然，足觐其大节。诗句多不事雕镂，自然高雅。黄花晚节一联，久为世所传诵，而其他随时抒兴，亦多寄托遥深。江少虞《事实类苑》称琦作《喜雪》一联云：“危石盖深盐虎陷，老枝擎重玉龙寒。”人谓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，固未免涉于附会，非琦本旨。至于司马光《诗话》称其罢相守北京，新进多凌侮之，琦为诗云：“风定晚枝蝴蝶闹，雨匀春圃桔槔闲。”时人推其微婉。强至《韩忠献遗事》称琦在相台，作《喜雨》诗，断句云：“须臾慰满三农望，却敛神功寂似无。”人谓此真做出相业。则实能得其寓意。盖蕴蓄既深，故直抒胸臆，自然得风雅之遗，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。《名臣言行录》载司马光辞枢副时，琦有书与文彦博。《东莱诗话》载是时亦有二书与光。吴师道《礼部诗话》载琦手书《早夏》三诗，备萧散闲适之趣。皆《安阳集》所

韩琦与《安阳集》

熙宁八年（公元1075年）六月，北宋一代名臣韩琦病逝于相州。消息传出，朝野震动，神宗皇帝为他发哀苑中，痛哭失声，辍朝三日，并亲笔为他题写了“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”。赠尚书令，谥忠献，配享英宗庙庭。

韩琦字稚圭，相州安阳（今河南省安阳市）人，北宋名臣韩国华之子。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七月。仁宗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，二十岁的韩琦考中进士第二，当年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淄州，从此步入仕途。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里，除通判淄州与丁太夫人忧之外，韩琦一直在京城任职，历直集贤院、监左藏库、开封府推官，迁三司度支判官，授太常博士，随后任右司谏。他不论在哪个职位上，都是尽忠竭力，孜孜不倦。

任右司谏时，韩琦以对朝廷的耿耿忠心，敢说敢为。《宋史》本传说：“时宰相王随、陈尧佐，参知政事韩亿、石中立，在中书罕所建明，琦连书其过，四人同日罢。”一个小小的谏官，敢于疏劾当朝四位宰辅，这需要相当的勇气。宰相王曾是个很少褒奖他人的人，见到韩琦如此以朝廷为念，以国事为重，不禁叹道：“今言者不激，则多畏顾，何补上德？如君言，可谓切而不过矣！”这番话对

年未三十的韩琦激励甚大，他更加全身心地勤于王事。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，他以昭文馆直学士的身份充北朝国信使。从契丹归国后，在知制诰、知审刑院的职位上干了短短几个月，便逢西夏元昊叛命，朝廷拣择良臣御边，韩琦与范仲淹膺此大任，副老臣夏竦为陕西马步军副都总管，奔赴西陲。在韩琦一生中，从事军旅战阵之事从此开始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历程，此时他年仅三十二岁。

此时宋、夏局势十分紧张。夏主元昊是个桀骜不驯之徒，早在其父赵德明为夏主时，他就劝其父“勿臣宋”，赵德明深知夏土的安宁来之不易，告诫元昊说：“吾族三十年衣锦绣，此宋恩也，不可负。”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三〇）然而元昊却不以为然，答道：“衣皮毛，事畜牧，蕃性所便。英雄之生，当帝王耳，何锦绣为！”（同上）所以他袭封之后，操练兵马，号令诸部，同时仿效宋朝置文武百官，立蕃、汉学堂，为称帝作好了各种准备。

宝元元年，元昊在自以为时机成熟之时建国大夏，自称大夏皇帝，并立即开始了对宋朝的进攻。北宋对北方的契丹、西北的西夏一直采取妥协绥抚的政策，然而面对骄横无忌的夏人，宋仁宗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，不得不集结重兵于西北，迎击来犯之敌。

韩琦与范仲淹皆当时名臣，然而在军事战略问题上，二人见解却不同。陕西总帅夏竦具攻、守二策，令副使韩琦、判官尹洙赴阙奏请，仁宗取攻策。然而执政大臣却不主张大举攻伐，连范仲淹也认为此时应坚守边塞，观其动静，以备招纳。韩琦仔细分析敌我形势，以为“贼昊倾国入寇，不过四五万，老弱妇女，举族而行。吾逐路重兵自守，势分必弱，故遇敌不支。若大军并出，鼓行而前，乘贼骄惰，破之必矣。屯二十万重兵，只守界壕，中夏之

弱，自古未有！”他的这一主张与仁宗甚合，但终因朝臣阻遏，难以施行。虽然如此，韩琦在军事上的卓越见识，已经深深印在仁宗心中。

在这段兵戎岁月中，韩琦时时欲建立边功，以报国恩。他与范仲淹合力御敌，深得将士信赖，当时人称“韩范”。不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韩琦部将任福贪功冒进，违背韩琦一再叮嘱“不可轻与敌战”的诫训，被夏人引入包围圈，战死于羊牧隆城。此举对宋朝无疑是一个重挫，以至元昊更加轻慢宋朝，同时朝中主张防御的保守派亦找到了攻击韩琦的口实。此时韩琦的处境十分困窘。幸而不久清理战场时，夏竦在任福衣带中找到了韩琦写给任福的诫令，方知此败责任不在韩琦。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十月，朝廷分陕西为秦凤、泾原、环庆、鄜延四路，以范仲淹领环庆，韩琦领秦凤。二人均有志疆场，屡挫夏兵，基本上控制了西北局面。仁宗对韩、范的才干十分赞赏，故于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三月，召二人还朝，同任枢密副使。此时仁宗为改革弊政，又任用杜衍、富弼等人居于重位，实行新政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庆历新政”。同年八月，韩琦以枢密副使的身份重返陕西，为陕西四路宣抚使。

此时朝内党争日趋激烈，宰相杜衍因其婿苏舜钦坐事受到牵连，遭到贬谪，保守派势力开始占上风。与杜衍相知的富弼、范仲淹亦接连被贬出京师。韩琦在政治上也是深得杜衍信赖的，所以保守派并未因他在陕西而放过他。庆历四年，韩琦自陕西召还后，郑戩接替了他的职位，郑戩部将刘沪、董士廉修筑水洛城，役兴而郑戩罢。韩琦部将尹洙认为修水洛城并非良策，制止刘、董，而刘、董置之不顾。尹洙盛怒之下，将二人械系起来。郑戩为此屡争于朝，矛头直指韩琦，朝廷大臣亦多偏于郑戩。韩琦深知此

时已到了事不可为的地步，于是自请补外，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。至此为止，庆历新政中的主要大臣均被清洗出朝。

此后，韩琦在地方官任上历经十二春秋，由知扬州调知郢州、真定府、定州、并州、相州，直至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七月，才被召还朝，充枢密使。在仕途上，韩琦从这一年开始，真正步入了大有作为的时期。一年多后，以集贤殿大学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副相），至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加昭文馆大学士，为政府首相。

宋仁宗在位四十馀年，至晚年仍无子嗣，时群臣皆以建储为言，而仁宗依违不决。当时身为副相的韩琦也认为此为国之大本，不可拖延，于是劝仁宗择宗室之子立为皇太子，以安天下之望。仁宗以“后宫将有就馆者”为辞止其议，然而“就馆者”所生又是女子。此时仁宗病情日重，包拯、范镇、曾公亮、欧阳修等人屡言立嗣之事，知谏院司马光受韩琦之意上书，援引前朝因不及时立嗣而导至奸臣乱国之祸开悟仁宗，仁宗始悟。韩琦见时机基本成熟，于人时对再提此事，终于使仁宗决定立宗实（即后来的宋英宗）为太子。韩琦恐事有变，又奏：“事若行，不可中止，陛下断自不疑，乞内中批出。”这样，立嗣一事终得圆满。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仁宗驾崩，英宗顺利地继承了帝位，完成了政权交接，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动乱。

然而英宗有疾，不能处理国事，只好由皇太后（仁宗曹皇后）垂帘听政。由于英宗对宦官少恩，宦官甚怨，便在英宗与太后间拨弄是非，使二人日渐有隙。韩琦为此深深忧虑，分别对英宗及太后晓之以理，且以危言谏太后说：望太后善待英宗。英宗为一朝天子，万一有事，太后岂能全脱干系？此后二人渐至亲近。英宗病愈后，韩琦力劝太后还政。在韩琦的斡旋下，太后撤帘，还政于英宗，朝

廷得以安然。时人叹赏韩琦有定国之大勋，为言不虚也。

英宗执政三年，病已垂危，此时朝廷又面临严峻的局面。身为首相的韩琦再次扮演了安澜排难的重要角色。曹太后与英宗虽然和解，然而旧时的阴影不可能全部散尽，因此英宗病重时，曹太后有意在宗室中另择宗子而立之，不想立英宗之子为嗣。洞察秋毫的韩琦担心此事会引发朝廷混乱，故而在英宗弥留之际，极力劝英宗写下遗命，立其子为皇太子，使朝廷再次避免了一场夺位之争。神宗即位后，对韩琦十分感激，说道：“若不是他韩琦，朕只是一皇亲太保耳。”这话虽然带些为个人利益感恩戴德的色彩，但从整个国家利益来看，政权的顺利交接，保持朝政的稳定，于国于民，都无疑是一件好事。

神宗即位后，启用王安石为相，开始了熙宁变法。韩琦与王安石相识甚早，早在韩琦知扬州时，王安石即以新进士的身份为淮南幕僚。韩琦对王安石的评价是“为翰林学士则有馀，为宰相则不可”。新法实行，韩琦担任判大名府兼河北四路安抚使，在新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，他看出了其中的弊端，于是给神宗上书，请求停止新法的实施。对于王安石变法，我们认为：王安石的初衷固然是为了强国富民，但他急功近利，求其速成，企图在百日之间便扭转一个王朝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，未免过于天真；再则任人不辨忠奸，鱼龙混杂，凡赞成新法者皆擢拔之，凡非议新法者皆贬黜之，孰不知一些邪佞之徒恰恰钻了这个空子，以拥护新法为名而窃据高位。其结果是一些原本利民的法令到了实施之时，便变成了害民的科条。韩琦在给神宗的奏疏中，列举大量的事实，说明新法之弊，这也表现了一个老臣对国家、对朝廷的一片忠心，如若不然，他尽可以置变法于不顾而安度晚年。由于王安石的坚持与神

宗的犹豫不决，新法得以继续实施。韩琦认为自己于事无补，加之年老多病，便请求回到乡郡相州。熙宁八年夏，病逝于相州，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，享年六十八岁。

对韩琦的评价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。

一、朴忠

韩琦的一生，是忠于国家、忠于朝廷的一生，他所做的一切事，都是从是否有利于朝廷、有利于国家的大局出发。他做基层官吏勤恳尽职是如此；任右司谏时弹劾权幸，进称杜衍、范仲淹是如此；使蜀时已把关系国家安危的西事放在心上，仔细思考御敌之策是如此；任西帅后，出生入死是如此；任枢密副使时，不论是否属于自己职权范围之事，尽言论之，也是如此。正是凭借了这种出自内心的忠直，博得了上至皇帝、宰臣，下至同僚、属下的叹赏。

宝元二年，元昊入侵保安军，两国间的战争全面展开。韩琦使蜀回朝，借复命之机，把自己深思熟虑的御敌之谋和盘托出，“论西师形势甚详，即命安抚陕西”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三〇）。他是凭借自己的忠诚和智慧奔赴西部疆场的。在对西夏的战略上，他的见解与仁宗不谋而合，主张主动出击。但是，由于部将任福不听节制，贪功冒进，至使兵败好水川，韩琦的计划没能实现。虽然后来证明了此次战败责任并不在他，但他还是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并没有气馁，在知秦州期间，他修广城寨，招怀种落，训戢营屯，厉兵以待贼。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陕西四帅皆改观察使，由于观察使为武职，范仲淹、庞籍、王沿等都不愿接受此职，而韩琦认为“当朝廷忧边之秋，非臣下择官之日”，独不辞。

元昊借契丹为援，向宋朝索求无厌，宰相晏殊等人厌兵，意欲从其所欲。韩琦认为这样做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，于是极陈其不可，仁宗采纳了韩琦的意见。任枢密副使时，他逢事必言，即使是中书省诸事，有不利于国者，他也反复指陈，以至中书省长官颇为不悦，而仁宗却慧眼识珠，夸赞他说：“韩琦性直！”不少人对韩琦直言无忌捏一把汗，劝他少说为佳，韩琦却全然不以为意。

韩琦担任宰相后，在十分复杂的形势下，两度拥立帝王登位，且做事缜密，点滴无漏，如果没有对宋朝的耿耿忠心，没有无私的精神与大智大勇的气概，是难以完成这等重大事的。且看下面这几段文字：

“仁宗疾亟，英宗已立，亲王皆入后殿。国朝制度：嗣天下即位，先亲王贺，次六军，次见百官。公是先时独召允弼入，称先帝晏驾，皇子即位，大王贺。允弼谓：‘皇子为谁？’曰：‘某人。’允弼谓：‘岂有团练使为天下者？何不立尊行？’公曰：‘先帝有诏。’允弼曰：‘乌用宰相！’遂循殿陛上。公叱下，云：‘大王，人臣也，不得无礼！’左右甲士已至，遂贺。次召诸亲王，见六军、百官，中外晏然。”（《韩魏公别录》）

“仁宗初晏驾，急召上，未至，仁宗复手动。曾公愕然，亟告公，欲止召太子。公拒之曰：‘先帝复生，乃一太上皇！’愈促召上，其达权知机如此。”（同上）

当其国事张皇之际，能全然忘我，处乱不惊，使局势恢复安定，这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识，但仅仅有勇气和胆识是不足以成大事的。韩琦最大的长处，就是凡事以公为心，以忠为心。《宋史·韩琦传》说：“嘉祐、治平间，再决大策，以安社稷。当是时，朝廷多故，琦处危疑之际，知无不为。或谏曰：‘公所为诚善，万一蹉跌，岂惟

身不自保，恐家无处所。’琦叹曰：‘是何言也？人臣尽力事君，死以生之。至于成败，天也，岂可豫忧其不济，遂辍不为哉！’闻者愧服。”

韩琦的忠诚同样表现在他晚年任地方官之时。《宋史》本传说：“王安石用事，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钱，琦亟言之。帝袖其疏以示宰臣，曰：‘琦真忠臣，虽在外，不忘王室。朕始谓可以利民，今乃害民如此。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亦强与之乎？’安石勃然进曰：‘苟从其欲，虽坊郭何害？’明日，称疾不出。当是时，新法几罢，安石复出，持前议益坚。琦又恳奏，安石下之条例司，令其属疏驳，刊石颁天下。琦申辩愈切，不克从。于是请解四路安抚使，止领一路，安石欲沮琦，即从之。”更为可贵的是，当他的意见为王安石所沮，朝廷依旧决定实行青苗法时，身为大名府知府的韩琦并没有固执己见，而是尽力推行新法。他认为自己作为老臣，对国家法令的得失当言则言；而作为地方官，对国家法令，则应坚决执行，否则就是不忠。其审时知分，尽责而又尽忠，可谓完美无缺了。

二、宽和以容人

韩琦一生待人以宽和，尤其是对私家恩怨，更是不萦其怀，这种豁然大度的作风，赢得了当世人的钦敬。我们随手举出几例，便足以见一代伟人的风范了。

“李师中为布衣，父镇戎退阵当斩。公驰至镇戎，以贼众我寡，非诸将罪，且欲戮其为第一。师中父在贷中。方请于朝，时师中赴南官试，遂上书论公募民为兵往应贼太扰，乞斩公以谢陕西。既不行，后尝有疑公心。执政有请勿害师中者，公笑曰：‘彼是时以子救父，岂可加罪？’人闻之，咸服其公恕，然师中终未之信。后擢为两制，师中方愧服，且深谢之。”（《韩魏公遗事》）

“公兄为泰倅，孙元规为司理，尝荐之，公遂拜元规书问，未尝逾时不讲。后公为西帅，兵败，元规领言责，深议公罪。朝廷知罪不在主帅，少谪即复。自此元规嫌公，书问遂绝。公一日以书问元规：‘平日事契如此，若以伯氏尝荐而后见攻，此乃韩厥之举也。若琦当言责，亦不为元规隐，此何待琦之不广，愿公勿疑。’元规亦疑之，终不讲书。公秉政，颇以公有害己心。后起废为庆帅，元规过阙，乃泣见公曰：‘沔真小人！公知沔，沔不知相公！’”（同上）

李师中、孙沔并非人们心目中的“小人”，仅仅是器量狭窄而已。韩琦的大度，能使器量狭窄的臣下愧服终生，不能不说是凭借着一种人格的力量。

在与同僚的关系上，韩琦始终抱着一种既恪守原则，又宽以待人的态度。比如他与范仲淹在西北时，见解每每不合，在争论国事时，二人往往各不相让，然而国事之外，二人始终如兄弟手足，所以西北兵民，惟知韩琦、范仲淹皆当世名臣，号“韩范”。在政府，韩琦在立储及其他重大问题上与富弼也有相左之见，但事过之后，二人合作如初。《宋史·韩琦传》说：“与富弼齐名，号称贤相，人谓之‘富韩’云。”就是与王安石之间，韩琦也每每以大器度待之。虽然二人在新法问题上各执己见，但细细推究，二人皆是出以公心，所以正人君子之间，仅仅是陈述不同政见而已，至于彼此的人格，他们总是互相敬服的。王安石曾有《贺韩魏公启》一文，对韩琦“内揆百官之众，外当万事之微。国无危疑，人以静一。周勃、霍光之于汉，能定策而终以致疑；姚崇、宋璟之于唐，善为理而未尝遭变。记在旧史，号为元功。未有独运庙堂，再安社稷，弼亮三世，救宁四方，崛然在诸公之先，焕乎如今日。

之懿”的勋业予以热情的讴歌。蔡上翔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说：“此煌煌乎宇宙大文也，琅琅乎歌声若出金石也。魏公一代伟人，得此悬诸日月，可以为传为铭为赞，虽有他作，弗敢请已。”王安石变法开始后，韩琦在河北上书“乞尽罢诸路提举官”，一切依旧法而行，王安石自然不能予以认同，所以在整个变法过程中，两人始终站在对立的立场。但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将韩琦视为仇敌，后来韩琦去世，王安石为他作挽词二首，其中写道：“心期自与众人殊，骨相知非浅丈夫。”又：“幕府少年今白发，伤心无路送灵輶。”表达了自己对一代伟人的深深悼念。

能表现韩琦襟怀的另一方面，是他对待所谓“小人”的态度上。王岩叟《韩魏公别录》记载韩琦的话说：“知其为小人，便以小人处之，更不须较也。”“一当以诚。但知其为小人，则浅与之接耳。凡人至于小人欺己处，不觉则已，觉必露其明以破之。公独不然，明足以照小人之欺，然每受之而不形也。”“凡人语及其所不平，则气必动，色必变，辞必厉。惟公不然，更说到小人忘恩背义、欲倾己处，辞气和平，如说寻常事也。”强至的《韩魏公遗事》也有类似的记载，如：“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诚，往往为小人所欺，奈何？公曰：‘不然，亦观其人如何，随分数放之耳。’人谓公待人诚则皆诚，但有深浅以明济之也，岂可以为小人不待以诚邪？皆叹以为不可及。”在韩琦的一生中，遇到最典型的小人莫过御史王陶。王陶初为小官，因受到韩琦奖拔，一步步走上高位，擢为近臣。英宗即位后，由韩琦举荐，为皇子伴读，又为太子詹事，可谓待之厚矣。神宗即位，王陶自以为东宫旧属，理当进入政府，不料仅拜为御史中丞，意甚不平，他怀疑韩